

XUEYUAN
学苑 WENCUN
文存

辞赋

研究

熊良智/主编

CIFU YANJIU

CIFU YANJIU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学苑文存

辞 赋 研 究

熊良智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赋研究/熊良智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学苑文存)

ISBN 7-100-04507-X

I. 辞… II. 熊… III. 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I206.2②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46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辞 赋 研 究

熊良智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507-X/I·41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0

印数 4 000 册

定价:40.00 元



学苑文存编委会

主 任 李 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光治 马正平 邓英树 刘永康

李大明 李天道 李 凯 李 诚

吴明贤 唐小林 曹万生 熊良智

序

蜀中号称“天府之国”，除了得天独厚的优裕的生活环境，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化之邦。二千余年，名家辈出，汉宋两代，领袖风骚。近代以降，蜀中学术再放异彩。在风行天下的“京派”与“海派”之外，“蜀学”虽然偏安一隅，却也独树一帜，鼎足相望。在相对隔绝的盆地环境里，有一批甘于淡泊的学者皓首穷经，以深厚的国学根柢和严谨的朴学精神，承续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回想一九六二年秋天，我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负笈入蜀，投奔庞师石帚先生门下，研治六朝唐宋文学，亲身感受到蜀中的学术氛围。日就月将，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石帚师乃蜀中名宿，门墙桃李，皆称翘楚，各有所归。一拨去了望江楼（四川大学），一拨上了狮子山（四川师院）。因而蜀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亦呈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势。石帚师闲谈所及，对狮子山的弟子多所称许。我侍听在侧，耳熟能详，内心亦不免有几分钦羡。如今岁月流逝四十余年，不但石帚师早归道山，昔日钦羡的各位同门先进，多数亦陆续作古。往事历历在目，却已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忆念。

友生李诚教授主持编选的这套《学苑文存》，汇集了四川师范大学（原四川师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半个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论文。翻看目录，既有前辈学者的佳篇，更有后生俊彦的新制。而尤其令我欣喜的，是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近代蜀学的某些因子。我以为一种学术传统既是顽强的，又是脆弱的。近代蜀学的传统经历了社会巨变的洗礼，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其实它并没有完全消泯，它的精神仍然不绝如缕地延续在蜀中学者的学术活动中，也延续在这套《学苑文存》里。然而如果

再不刻意地珍惜、保持和发扬的话,近代蜀学传统的消失也是指日可待的事。而继承蜀学传统的方法,是既要坚持蜀学独特的治学理念,又要与时俱进,追踪当代学术的前沿,才能使蜀学的精神保持绵长的生命力。这也是我对本书中年轻作者们的期望。

项 楚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汤炳正	《楚辞研究》前言	1
万光治	赋与赋学研究的命运(代序)	5

辞赋缘论

李 诚	诗骚异同简论	24
李 诚	诗骚异同再论	36
刘志成	楚方言考略	47
万光治	古赋与文赋刍议	56
刘朝谦	对话赋体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	69
刘朝谦	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关系	81
钟仕伦	汉大赋虚构性略述	92
赵俊波	窥陈编以盗窃——论唐代律赋语言的雅正特点	101
赵俊波	晚唐律赋的散体化倾向	115
赵俊波	论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怀古之作——兼论闽地 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	127

辞赋作家作品

汤炳正	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	136
高尔泰	屈子何由泽畔来——读《骚》随笔	155
魏炯若	《离骚发微》前言	169
汤炳正	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	187

周及徐	从《离骚》看汉语双音节词向单音节词的演变	198
李大明	《九歌》夜祭考	212
李大明	《九歌》语词训释商榷	224
李 诚	唐勒研究	235
李天道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247
王启涛	司马相如赋与四川方言	263
秦彦士	风骨学于诸子 华实化于骚赋——王褒赋简论	271
秦彦士	张衡的矛盾心态与创作	279
吴明贤	蔡邕赋论	291

辞赋文献

汤炳正	《楚辞》成书之探索	302
吴明贤	《九歌》为司马相如所作辨误	322
万光治	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	329
熊良智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346
李大明	敦煌写本《楚辞音》释读商兑	360
熊良智	《文选集注》骚类残卷在楚辞研究中的价值	371
熊良智	汪瑗《楚辞集解》在楚辞研究中的贡献	381
蔡锦芳	崔富章 戴震《屈原赋注》后所附《音义》撰者考	394
詹杭伦	论《雨村赋话》对《律赋衡裁》的沿袭与创新	423
詹杭伦	王芑孙及其《读赋卮言》叙论	449
后 记		473

《楚辞研究》前言

汤炳正

中国屈原学会已成立七年了。我们开始曾认为,既是学会,理应有个定期刊物,作为会员们发表论文的园地。但这不过是“望梅”、“画饼”,想想而已,谈何容易!后来,学会成立大会的论文,总算结成了个集子,即《楚辞研究》(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记得当时,我曾写信给学会名誉会长姜亮夫教授,请他题书签。他正病重住院,竟为此专程带病回寓,以惯用的笔砚,写下书签寄来。不难看出,老一代的屈学前辈对这个集子寄以多么殷切的期望!当时的打算,是将每年会的论文编成一本《楚辞研究》,一直延续下来。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连这样一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计划,也并没有能够实现。

说句老实话,我们不少同志都有一种感觉,即:当前群众性的学术活动虽比任何时期都繁荣,但离开金钱就寸步难行。而我们这批以钻故纸堆为职业的“秀才”们,则真是生财无路,告贷无门。就在这万般无奈之际,对出版论文集的问题,大家想了个笨办法,即希望年会在哪省召开,就由该省勤俭办舍,节约开支,留下几个钱来出《楚辞研究》。本期《楚辞研究》之得以跟会员们见面,就是贵州省的同行们依法炮制出来的成果。也正因为上述原因,这个论文集的编辑班子,并不是理事会的常设机构,而是根据理事会的意见由秘书处跟该省同志及有关各方共同商量,互相合作,搭个临时班子把工作担起。至于下次年会在哪里开,能不能出论文集,编辑班子如何搭配等等问题,目前皆在未知之例。

但是不管怎样,这几十年来的屈学发展,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第一个浪头,是从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屈原开始的;第二个浪头,是从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第三个浪头，是从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开始的。其实，学会的成立，不过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党的“双百”方针把屈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些年来，屈学阵营，日益壮大；屈学论著，成果累累；而且对某些学术问题，也确实有了新的突破，在屈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点记录。就以这本论文集而言，其中就不乏有质量的好文章。

可是俗话说：“旁观者审，当局者迷。”我们自己估量自己，难免有些片面性；真正“有自知之明”，究竟不易。因此，广泛地听一听学术界的种种议论，是有好处的。例如，屈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学术界公认的，这固然是客观事实；但屈学研究的不足之处，乃至不正之风，也还是要听听各方的反映。如有的同志在肯定屈学成果的同时又指出：“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某些人好逞臆说，而不重实证；名曰宏观，实为空谈；名为创新，实为哗众取宠。”“主观臆测，标新立异”。有的同志甚至来信指斥：“一部分所谓研究，实质上是在亵渎社会科学，嘲弄屈原。”学术研究“应当对后人、对历史负责”。又如今年一部屈学新著刚出版，立刻就有不少同志告状，说作者“剽窃”了他们的论点或论著。如此等等。应当说，上述这些意见，既非新旧学术思想的论争，也非不同学派之间的偏执，更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之异，而是学术界普遍关心了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重视。

我认为，世上的事往往会从正面走向反面，而正、反之间又是互为因果的。纵观这十多年来的屈学研究，似乎可用三个字来概括：热、新、活。这三者，从学术动态来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也正是在这三股浪潮的冲击下，屈学界的某些同志出现了学术思想的倾斜。

首先谈“热”。一般来说，“热”并没有贬义，如“文心雕龙热”、“红学热”等等。由于人们热爱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形成了一股“热潮”或“热浪”，这并不是坏事。“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对这门学科的研究探讨，无疑是有好处的。而且，从屈学界来讲，这几年来也确实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有实学的后起之秀。关于《楚辞》研究成果，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从1977年以来，楚辞研究中出版专著已逾百部，在海内外各类报刊上发表论文已逾两千篇。这数字是惊人的，二者合计，它几乎相当于1977年以

前的两千年楚辞研究成果的总和。当然,这其中为了“赶浪头”、“凑热闹”而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的“急就章”,是难免的;由于信息不灵、囿于见闻而导致课题撞车、浪费精力者,亦不在少数;甚至因为功力不足、急于求成、东抄西凑、言非己出者,也时有所见,……因此,在这股“楚辞热”的浪潮中,我们应当提倡一个“冷”字。我们对待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感情,不妨热烈,而研讨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头脑,则必须冷静。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五年六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我相信,在热潮中形成的这支庞大的屈学队伍,其中有的同志尽管还不够成熟,但他们一定会“闹中取静”,吃得苦,耐得冷,从而茁壮成长起来。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也。

其次谈谈“新”。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进步。这一点,我们一向就在强调。但我们同时更强调: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所谓“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我们的屈学研究中,有不少根深叶茂、探骊得珠之作,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只以争新斗奇为目的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正如学术界所批评的那样。

而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求“新”,毛病出在“新”而不“真”。当然,即使目的在于求“真”,而结论仍非“真谛”,这也是学术史上常有的现象。可是,为求“新”而求“新”,以逞奇为能事,是不足取的。而且,王充《论衡》曾说:“文有伪真,无有故新。”这话很中肯。因此,对前代的学术遗产,不能抱虚无主义的态度。如果“真谛”所在,不能因其旧而废之,正如无稽之谈,不能因其“新”而从之。从人类文化整体来讲,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不能继往,也就不可能开来。永远从零开始,就永远没有进步。

最后谈谈“活”。所谓“活”,是可以包括很多方面的,这里只准备谈学术思想。“活”就是指屈学界这些年来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凡是某一学术领域的思想活跃,就意味着这门科学的前途充满希望。如果大家都是死水一潭、铁板一块,则创造性的突破是很困难的。这些年来,屈学论点的众说纷呈,研究方法的多元竞秀,文风笔调的不拘一格,等等,确有百花齐放之

妙。但是,学术思想的活跃,必须跟严谨、扎实的学风和刻苦读书的功力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要是光靠思想活跃,而放松了一步一个脚印地读书学习,就会在研究上出现逞想象、凭推理,轻事实、缺论据的偏颇。因而不仅宏观研究不能步步生根,微观研究也难丝丝入扣。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见他老先生是“学”、“思”兼重的;但他又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则他又把脚踏实地的学习放在第一位,颇有辩证观点。《荀子·劝学》也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看来,他们都懂得“思”、“学”并重、以“学”为本的道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古人咏橄榄的诗句:“皮肉苦且涩,入口复弃遗。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飴。”我们对来自各方的意见,无论怎样尖锐,而在冷静的“回味”之后,都会有所收获。这并不是由于“人言可畏”,反而应该感谢“将伯之助”。现在,借《楚辞研究》二期出版之际,写出如上的一些体会。愿以此与屈学界的同行们共勉之。

原刊《楚辞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赋与赋学研究的命运(代序)

万光治

在古代的各体文学中,诗、文、赋是资格最老的正统文学形式。虽然如此,赋的地位与诗文比较起来,总有着无法摆脱的尴尬。这里所说的尴尬,并不在于它的数量少于诗文,也不在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不如后者,而是在于,它在文人正统的文学观念之中,获得的始终是暧昧的身份和暧昧的评价。正是这种尴尬的地位,不仅影响到赋文学的创作,影响到古代的赋学研究,也使建国以后的赋学研究一度陷入窘境。因而对这一现象的回顾与研究,不独有助于赋学研究的深入,即对古代文学观念与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也未尝没有认识的价值。

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汉代曾以其大国的姿态,独擅文坛,的确留下过它辉煌灿烂的记忆。

赋所以有如此幸运,不仅因为它兼擅先秦诗、骚、散文之所长,适应了汉人兼容前代文化的大一统心理和汉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汉代独特的文化环境,也是使它获得如此显赫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因其文学的传统观念所致以及经学的视文学为附庸,不独文章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少有纯粹的文学作品出现,即素称吟咏性情的诗歌,也因为文人的性情为经学所陶冶,被纳入缺乏个性的集体人格,并在表现中受到严格的压抑,而一度陷入沉寂。赋的勃然兴起,无疑使它在与诗、文的比较中,天然地获得了纯文学的地位。

然而,赋的幸运,仅仅是现象的一个方面。就在赋陶醉于“与诗画境”、“蔚为大国”的时候,经学对它并未表现出大度和宽容。尽管赋一再努力以自己“依经立义”和“润色鸿业”的内容实现对经学的皈依,但毕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赋的文体功能和表现形式,去适应经学尚质轻文的观念。所以,赋与赋家,很难不受到经学的抨击。^①

值得注意的是,经学之影响于赋学,仅突出地表现在汉代。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些远较经学的影响力更为深远、更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影响并确立了诗、文、赋在正统文学中的位置,赋的命运,这才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

中国的文人,诞生、成熟于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社会局面的动荡,使文人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心性,变得异常的成熟。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文人因忧患现实,过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肩负有干预现实的使命。而实现这个使命最直接的方式,则莫过于从政。兼之文人生活在商品经济素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其精神劳动产品的非商品化,更注定了文人以入仕为唯一的出路。上述原因,使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和对现实政权的依附,构成中国文人角色意识的核心内容。如果以此为观察问题的立脚点,则不难发现,诗、文、赋作为文人实现角色的手段,有着很不相同的功能和价值。

首先说文章。对文人的干预现实来说,文章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手段。这些文章,虽然并不能直接成为操作的工具,却是指导调整国家机器,修补世道人心的论证与设计;文人是否具备经世的眼光和是否具有被现实政权录用的资格,也往往是由此见出的。所以,文人人仕前后大量写作的文章,最重体国经野的使命和价值。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内容,使文章在权力与实践之间,天然地具有了中介的性质。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各体文学之中,文章最能体现文人的角色意识和传统的文化精神,因而在古代的正统文学中,核心的地位,自然非文章莫属。正因如此,不仅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建安时期,曹丕在说“诗赋欲丽”的同时,仍强调“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使到了唐代,韩愈倡导了世所称道的“古文运动”,而这运动的根本动因,仅在恢复古道,而非革新文章。严格地说

来,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拯救世道人心的思想复古运动的副产品。直到宋代,从欧阳修到苏轼,纯粹的文学散文才大量出现。苏轼推崇的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②,这样的见解,可说是体现了文章的文学自觉。虽然如此,经世的文章,在此时和以后,仍然在数量上占压倒的优势。因为只要文人境况不变,文章的传统不会改变,而文章在正统文学中的地位,也是不会改变的。

文章而外,在正统文学中,备受文人青睐的是诗歌。自先秦两汉以来,诗歌的教化传统与文章的经世传统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故古代诗歌的各个流派,无不高扬这一传统的旗帜。但文人的好作诗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能够导泄情志,是文人调剂内心平衡的一种有效手段。文人从政,未必都能如愿;即使如愿,又未必都能如意,于是心有郁积,不吐不快。此外,文人多元的情感生活与文化趣味,诸如述人伦之情,叙山水之乐,无不可以借助诗歌得以表现和满足。这类诗歌因为较文章更少一些外在的功利性,也就更贴近文人的内心世界。到了唐宋,被称作“诗余”的词兴起,文人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一些不那么符合“正统”的世俗性内容,过去因为诗歌雅颂精神的压抑而未得宣泄,现在才算找到了一种较为惬意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文章与诗歌在文人的角色生涯中,已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文人进则以文章经世,退则以诗词悦情畅神,左右逢源,应付裕如,两者的关系,颇类似儒道之于文人的“达则兼济”和“穷则独善”。文章与诗歌互补,成为协调文人行为、心理的两大手段,文人的角色意识,也才因此不会出现倾斜甚至崩溃。

正统文学有了诗、文这两个大国,赋摄乎其间,便很难再有幸运降临。尽管班固早已说过,赋是“古诗之流”、“雅烦之亚”^③;刘勰也说赋可以“触兴致情”、“象其物宜”^④,似乎赋的颂美与讽谏、抒情与状物与诗歌并无多大的区别。尽管刘勰还说过赋可以“体物写志”,其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之赋、“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⑤似乎赋又可以与原道、征圣、宗经、致用的文章相媲美。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赋以其独特的文体功能和表现方式,进不足以经国治世,退不足以充分地实现人更为内在的精神需求。就前者而

言,赋不如文章更直接,更富于功利性;就后者而言,赋不如诗歌更便当,更富于抒情性。原因在于,与文章相比,赋是美文,其“体物”的辞藻往往淹没了“写志”的宗旨,损害它功利性目的的实现,所以汉武帝读完了《大人赋》,才会“飘飘有凌云之意”。与诗歌相比,制作而非创作,是赋的一种最重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心态。关于司马相如、扬雄作赋之苦、左思为《三都赋》耗去十年心力的记载,已道出大赋创作心理过程中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特征。赋家的才气,主要体现在能否驾驭如此丰富的知识和技能,经营如此庞大的体制,赋家的想象,也主要体现在能否借助这些知识和技能去表现已经类化了的事物和类化了的主题,而并非用于表现属于个人的情志。即咏物小赋和骚体赋,前者滞着于物象而精于刻镂;后者意摹放楚辞和铺叙式地为文造情,依然不脱制作的痕迹。这样制作出来的赋篇,即用于“抒下”和“宣上”,绝无文章的切近事实;用于抒情言志,也绝无诗歌的富于灵性。当然,这样的评价,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个别的优秀之作,自然不在此列。

可见赋在正统文学的两个大国之间,其地位的尴尬,并不仅仅在于它非诗非文的形式,赋以其独特的文体功能和文体特征;从传统文学观那里获得的,始终是暧昧的身份和暧昧的评价。

二

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⑥,已让人从中感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⑦,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扬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人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⑧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

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一悲剧性的现实: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他是一个服膺于官方的文章家和史学家。如此自相矛盾的评价,说明具有多种角色意识的班固,很难公然正视赋的文体功能和文体特征,因而也无法在正统文学中,给赋以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由此可见,即使在汉赋独擅文坛的时期,它的纯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文人充满自信的认可。

东汉后期,因为文人心性的解放,诗歌汲取了赋文学给予的艺术养料,渐次复苏。与此同时,赋又接受了诗歌的因素,完成了它的抒情化和小品化。齐梁时期,声律说的确立与对实践的指导,不独奠定了律诗的雏形,也影响和成就了俳赋。尽管这时的文章仍努力保持着昔日不苟言笑的尊严,但在六朝人尚美的作风和声律学说的冲击之下,也居然从中分化出了骈文。自此,即传统的应用文字,诸如令、教、书、启,也大都乐于借助骈文的形式。足见传统的文章观念,已难束缚文人唯美的创作冲动。赋的骈偶化与文章的骈偶化,使它们狭路相逢,常常把对方误认为自己的孪生兄弟,以至后世眼光精审的选家,为鉴别它们当中一些作品究竟是骈文还是俳赋,不得不持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此外,这一阶段,士族制度确立,文人的仕进依门第而不依能力,这就在士庶矛盾之外,士族多了一份惰性,庶族多了一份牢骚。他们的相似之处,便是都淡化了传统的角色意识,其于正统文学的诗、文、赋不仅少了些厚此薄彼,而且更注意它们共同的文学特性,诚所谓“六朝之文,与尔时诗赋,一种笔墨^①”。这一系列因素,更促进了各文体在振荡与互渗中发展,谁也无法雄踞独尊的地位。正如思想的解放迎来了儒、释、道的三教并立,正统文学也形成了诗、文、赋的鼎足而三。作家为文,兼重各体,并无偏废,即数量也保持着大致的均衡。批评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汉人文学观念的影响,对赋少了一些传统的偏见。陆机《文赋》,诗赋并举;肖